

河洛春秋

豫西敌后抗战(2)

□记者 孙钦良

黄河怒涛：孟津抗战小故事

今年6月，“抗日战争皮定均徐子荣支队渡河处纪念碑”在孟津县白鹤镇河清村落成，这块长方形巨碑不用青石雕刻，而是用红色碑面，寓意明显。

“皮徐支队”当年渡过黄河后，先来到孟津地界，点燃了抗日烽火。孟津文人孙顺通对此做过深入调查，他说：当年，“皮徐支队”为顺利登上南岸，事先派人与河清村爱国人士宋维亚联系，要他做好南岸伪军的工作，宋维亚答应了。

1944年9月22日，“皮徐支队”1700余人登上南岸，宋维亚说服伪军，列队迎接八路军。皮定均号召大家团结一致，枪口对外，抗击日本侵略者。等到八路军走远后，伪军按照预先约定，朝空中鸣枪，遮掩过去。

但有汉奸告了密，说宋维亚“私通八路，放八路军过河”。1945年春，宋维亚被捕，日军将他吊在梯子上，用皮鞭打，用烙铁烫，灌辣椒水、屎尿水，还放出狼狗咬他，严刑拷打6天，他宁死不屈，始终没说出“放八路军过河”这件事。穷凶极恶的日寇用军刀砍掉了他的头——这是一位为“皮徐

支队”渡河而牺牲的抗日志士，豫西敌后抗战史上应予记载。

孟津境内的黄河地理特征明显，这一带发生了许多抗战故事。1945年初夏的一天，黄河上驶来一艘满载货物的木船，船逆流而上，向小浪底方向驶去。船头站了一个商人，头戴黑呢礼帽，身穿绸子长衫，面色凝重。船上还有几个船工，船工头目叫李树奇，小浪底附近南坡村人，是进步人士。突然，一艘飘着青药旗的日本船快速驶来，鬼子登船检查。船工都很担心，因为这船货主要是道林纸，是用来印制钞票的。

原来在抗战期间，日本人大量发行伪钞，掠夺人民财富。为了打击伪钞，从1939年开始，我太行抗日根据地冀南银行，针锋相对地发行了冀南钞票，缩小了伪币市场。但在抗战后期，国民党开始限制冀南钞票的发行，印制钞票的道林纸紧缺。

党中央指示地下党秘密采购道林纸，并利用孟津境内黄河，把纸张运到安全地点。船头上站着的那位商人，其实是我太岳军区情报员卫凤山。他事先搞到了日本人的通行证，那是个蓝本本，他让日本兵看了看，就被放行了。再往前面走，他却遇到了麻烦——被国民党特务盯上了。

本来摆脱日本船后，他们可以就近靠上北岸，走陆路运输纸张。但李树奇家里还准备了一些道林纸，他便继续赶往南坡村。国民党特务组织人马，正往那里集结。情况紧急，必须有人前去引开敌人，卫凤山要自己去，李树

奇说：“你不能去，你把这纸运到根据地才是正事！”说罢，他不顾阻拦，迎向敌人。

卫凤山和船工很快装完道林纸，李树奇却被敌人押走了。他受尽酷刑，说：“你们说我给共产党送纸，我就是送了！共产党也是抗日的，我犯了啥罪？！”敌人把他杀害了。

再说卫凤山到了黄河北，把道林纸交给我冀南银行，首长说：“谢谢孟津人民！这可是用鲜血染红的道林纸啊！”说完，首长对着道林纸三鞠躬。

孟津抗战曾有大战斗：立射庄战斗、小良村战斗、管道口伏击等，都曾威震敌胆，但这些都曾报道过，此处不述。其中长岭伏击战颇有意思，这次战斗表现了孟津人民诱敌深入的战斗艺术。

抗战胜利前夕，黄河北岸的日军渡河来扫荡横水镇长岭村。经过几年抗战，八路军驻洛孟新（洛阳、孟津、新安）办事处主任杜秉灿，早就组建了100多人的长岭抗日支队。他对大家说：小鬼子哪里知道长岭村又名“辘轳把弯村”，这里的山岭走势是“之”字形，鬼子只要进了这条沟，咱就伏击！

事不凑巧，侦察员报告：“鬼子这次不走辘轳把弯了，怎么办？”杜秉灿说：“咱们将计就计，引诱他走辘轳把弯就是了！”

前来扫荡的是石桥中队。

长岭村游击队员白娃装扮成“少妇”，石匠铁蛋装扮成赶驴的，让“少妇”坐到驴背上，前去引诱鬼子。当天日朗风清，视野开阔，石桥骑在战马上，后面跟着日本兵，

前面走着汉奸“李半仙”（外号）。李半仙说：“太君，快到长岭村了，岭旁住着三十四家农户，谐音正是‘山是死’，皇军不能走山沟，恐遭不测！应该绕道。”

石桥举起望远镜观望，见那个“少妇”穿红戴绿，衣色鲜艳，骑着毛驴，身材妖娆，正由一农夫执鞭驱驴，往辘轳把弯里走。

“花姑娘！”石桥看了兴奋不已，对李半仙说：“绕道的不要！走沟里的干活！花姑娘的！塞股塞股（脏话）！”然后命令部队跑步前进追“花姑娘”。顷刻间烟尘四起，日本兵都像是起了性的叫驴，追进辘轳把弯。

“少妇”白娃嫣然一笑，站在山岭转弯高处，解开了上衣，似要显露“她”的胸部。石桥一看，不知是计，催马便往前赶，却见那“少妇”解开衣襟，胸前的两只“奶头”顿时变成了两颗滚石雷，赶驴的农夫也从布袋里掏出滚石雷，拉开导火索，顺着山坡滚下去。

好家伙，是八路呀！鬼子纷纷卧倒，可为时已晚，滚石雷滚到鬼子群里，轰隆轰隆，炸死一片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埋伏在沟两边的100多名抗日支队队员，用步枪、火铳、猎枪、手榴弹一顿猛打，鬼子还没反应过来，就死伤了一大半。

赶来助阵的群众趁着这股子猛劲，手持长矛、大刀、钢叉、锄头、斧头冲了过来，直打得鬼子哭爹喊娘。这一仗下来，鬼子被打死几十个，其余的抱头鼠窜，之后再也不敢来骚扰。事后，杜秉灿专门制锦旗一面，上写“抗日先锋，杀敌有功”八个大字，赠给了长岭村。

河洛春秋

洛阳曲剧往事(12)

□记者 孙钦良

王振东：从小铁匠到曲剧大师

王振东是曲剧名丑，1919年出生在洛阳老城闹口街，父亲是赤贫市民，全靠拉车挣脚力钱养家，王振东只念了两年私塾就失学了，流落街头。

11岁时，他拜曲剧老艺人程金宝（艺名“宝贝”）为师，初学小生，后改丑行。他天资聪敏，凡师父教的戏，他学上几遍就会了，13岁便小有名气。但那时唱戏的人被看做下九流，父亲自然不愿他从事这一行。他14岁时，父亲送他到铁匠铺里当学徒，希望他能学一门手艺，将来养家糊口。

但王振东迷上了曲剧，非唱戏不可，身子虽在火星四溅的铁匠铺里，心思却在锣鼓铿锵的舞台上。打铁时，师父执小锤“砰砰”叫着点，让他配合着打铁。而他呢，却抡着大锤自顾自地打他的锣鼓点，气得师父吹胡子瞪眼：“你这是打铁吗？分明在做戏！”有时，师父明明用小锤发出指令，让他快打，他却想着曲子，偏偏打慢了；有时，师父轻轻敲小锤，让他慢打轻打，他却抡起大锤，一下子就打坏了自己的货件。

他不能在铁匠铺干了。父亲很生气，拉住他就打。他很委屈，说我想唱戏，你偏不让我唱，我干脆去报名当兵！父亲害怕了，把他叫回来，买了个货郎担，让他沿街叫卖雪花膏。

可他游乡时，一碰见唱曲子的，就放下货郎担，跟着人家唱开了。他做买卖总是亏本，父亲没办法，又请人教他学做雪花膏，本打算获两层利，谁知干了一年，还是不挣钱，他却在这一年里学会了几出戏——唉！此人生来莫非就是吃“开口饭”的吗？父亲不再管他，任由他折腾去。

有人曾撰文说：我在洛阳生活了三十年，看过王振东两出戏，一出是《阎家滩》，一出是《草人媒》，那演得真叫好啊！亏他没当成铁匠，他唱戏才是对路的。他排戏时，记性悟性都好，一说词就能上场；《阎家滩》中的王二，他演绝了，真是个天才！他在曲剧《卷席筒》中饰苍娃，跟曲剧名角朱六来（饰曹保山）配戏，那真叫珠联璧合，凡看过的人都说过瘾。

当时的洛阳艺人，都爱往陕西找台口（找演出机会），原因是河南连年战乱，百姓没吃的，养不活剧团。陕西地广人稀，混口饭吃没问题。1937年，王振东随师父程金宝顺着陇海线，一路演到西安，他看到有些逃荒人死在铁路边，手指头都风干了，也没人来掩埋，遇到的铁匠铺，大多都关了门，有人跟他开玩笑：多亏你学了唱戏，还能混口饭吃，要是还打铁，恐怕得“生吃大锤，红烧小锤”了！

王振东也有同感，于是更加卖力唱戏，一路唱到三原、耀县、泾县、铜川。1939年在西安演出期间，他承担了全部丑角戏。他唱腔醇厚，苍凉大气，字正腔圆，吐字清晰，能根据词意琢磨表演技巧，演活了人物，乐坏了观众，唱出了名气。

但洛阳艺人有个特点，思乡心过重，只要听说洛阳这边的日子好过了，就想回故乡。1940年，他回洛阳演出，很受欢迎。1944年5月，日寇占据洛阳，艺人受尽屈辱，心情都很苦闷，便有人学着吸大烟解闷，可他坚持不吸。抗战胜利后，河南省主席刘茂恩通令全省禁演曲剧，他第一个抗争，撺掇朱六来、刘卫生等人来到开封，硬是靠自己的艺术打破了禁演令，取得了曲剧演出的合法权利。

1947年，他组建“洛阳新生曲剧团”，赴陕、甘演出，那里有许多河南老乡，大家为了捧场，宁可少吃一顿饭，也要买票来看，还资助洛阳曲剧一些资金。他在西安、天水、兰州都很有名气。

当时在陕西、甘肃的河南戏班子，多有混不下去散摊的，但王振东走到哪里都有台口、有观众。1949年，王振东在西安组建了“华中曲剧社”，从洛阳邀来蓝辑吾、安景智等人，推出曲剧《小二黑结婚》，这是他演

新戏的开始，从此一发而不可收，到宝鸡演出时，他为贺龙演出《阎家滩》，贺老总看后很满意，对王振东的演艺大加赞赏。

接着他又回洛阳，1954年排《屈原》，他是导演之一，还扮演了剧中人。他给大家说戏：该剧除靳尚之外，还有三个丑角，老朽昏庸的子椒、幼稚骄傲的子兰、巧言诡诈的张仪，这些丑角各有个性，不能演得一样，要从人物性格出发，分别塑造人物。

他还演了《苦菜花》中的王柬芝、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的高大成、《红岩》和《江姐》里的徐鹏飞，个个活灵活现。1961年，他为陈云演出《草人媒》，饰二火鞭，大受夸赞。邓小平、彭真、董必武都看过他演的戏。1979年退休后，他不想远离曲剧，组织演员录制了《草人媒》、《卷席筒》等选段，制成磁带发行，还在影片《失信的村庄》中饰演了角色。1994年，王振东病逝。

